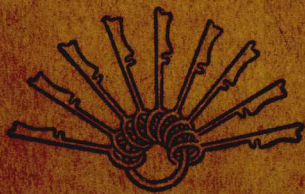


初中學生文庫

曾國藩

編者 胡哲敷



中華書局編印

標商無註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發行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再版

初中學生文庫 曾國藩 (全一册)



實價國幣一角四分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胡哲敷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

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九六四九)



會國藩像

一句不通 不看下句

今日不通 明日再讀

今年不精 明年再讀

——讀書耐字訣——

自序

從前奧國欺壓意大利，說：『意大利不過是地理上一個名詞。』侵略侮辱，無所不用其極；然而未幾何時，意大利是獨立了，民族是復興了，失地是收復了，國恥是湔雪了。此何以故？曰：民族精神未死之故。

現在我們國勢的危急，已不下於當時的意大利；然而一般國民，猶懵然視國家將亡，若無事然，這是多麼可痛的事！所以要做復興事業，第一步是要復興我們的民族精神。只要民族精神不死，國家遲早是有辦法的。

曾國藩的長處，不在治軍，不在爲政，而在他那副始終不變的精神。我們現在每人都應該有他那副精神，才能擔當救國的大任。這本小書，對於曾氏事業文章，當然未能詳盡；但是有此一編，已可略知曾氏生平事業的大概，與其立身行事的精神了。

我以爲青年心目中，不可不有一位理想的導師；有了一位理想的導師，自己行動就有了標準。遇自己鬆懈的時候，自然而然的就會有一種督勵的力量；這種力量，比父兄師

友的教導，還要來得切實而有效。青年既負未來最大的責任，宜有一種訓練自己的方法；假如立身行事，拿曾氏做個標準，精神必益淬勵，身心必益健全。大而言之，國人若能皆有曾氏那副精神，至少對復興事業，可增加一部分極大的力量，民族復興之路，未嘗不在於斯也。二十四年八月一日哲敷序於蘇州抱一廬。

曾國藩

自序

目次

頁數

第一章	曾國藩的時代	一
第二章	曾國藩的身世與家庭	八
第三章	曾國藩之進用	一五
第四章	平定太平天國	二二
第五章	曾國藩的政術	二八
第六章	新政的成績	三五
第七章	爲學與做事的精神	四二
第八章	結論	五三

曾國藩

第一章 曾國藩的時代

在離開我們現在一百二十幾年以前，湖南湘鄉地方，誕生了一位時代英雄。自從他任用之後，中國政權才漸漸地由滿人手裏，轉移到漢人手裏；清朝壽命，因之延長了六七十年；中國近年來一切新興事業，也算在他手裏種下了一個小小的根基。這人的確要算中國近世史上一個轉樞的人物。他是誰？便是本書所要說的曾國藩。

他生於民國紀元前一〇一年，

公元一八一一年清嘉慶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這時清朝極盛的時期已經過去

了。拿天上太陽來說，此時已是偏西的時分了。拿一個人人生來說，已是五十以後的人了。因為清朝在乾隆時，形式上確是文教武功，均極一時之盛；但是後此一切衰亂之徵，亦都在此極盛時期，種下根源。正如一個人在壯盛之時，仗倚着自己身體強健，種種戕生之事，無所不為；一至中年以後，便百病叢生，不可支持了。嘉慶、道光兩朝的政象，正是如此。而本章

所謂曾國藩的時代，亦應以此兩朝爲最重。因爲他的成就大半是時代造成的；雖然他在嘉慶十六年始生，但是自嘉慶以來的一切政象，無處不是激勵英雄的資料。他是這個時期激勵成功的，他的對手洪秀全一班人，也是在此時期激勵成功的；秀全生嘉慶十七年，少曾氏一歲。不過他們站在相反的戰線上，所以成功也是相反的方向。因此這幾十年國內外大勢，很有一述的價值。現在分四項敘述如左：

一 軍政的腐敗

清朝政治，要以嘉慶、道光兩朝爲腐敗達於極度的時期。這大部分的原因，自然是由於這兩人庸懦無能，用人不當；但亦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嘉慶的父親——乾隆在位的時候，揮霍太過度了，把國家的元氣斲喪得太厲害。在乾隆中年以後，國中現象，已處處表現着外強中乾，晚年又經一位權相和珅的貪贓枉法，剝削小民，嘉慶時和珅賜死，家產約八萬萬兩。百姓乃更無以爲生了。當此之時，縱有英明之主，勵精圖治，猶不易恢復百姓的元氣，何況嘉慶、道光，是那樣的庸闇而不識大體呢？

談到軍事，當滿族未到中國之前的確是很強悍，所以能統一滿洲內部的各小部落。自從到了中國之後，一見中國財物，他們就腐化了，就不願多上前線去打仗了，其所以能統一中國，實在是吳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一班漢族敗類，帶着自己軍隊去投降他們，並且替他們來殺自己的同胞，給毫無文化的滿人來坐享其成，做中國的皇帝。他們統一中國之後，軍隊大概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旗換兵，士將官都是滿洲人；還有一部分叫做綠營，是內地各省的地方軍隊，招漢人當兵，軍中的旗幟用綠色，號爲綠營兵。旗營兵士固然是養尊處優，吃糧不打仗了，就是綠營漢兵，也因爲受滿人忌妬和防範，也漸漸的腐化起來了。平時既訓練無方，而營規又不嚴厲。嘉慶初年，有人上書就說，『京兵不習勞苦，不受約束，征剿多不得力，距達州七十里之地，行二日方至。』嘉慶四年經略勒保所奏即此數語，已可見當時軍隊腐敗的狀況。他如軍官扣餉，縱兵劫掠，更是普通現象。到曾國藩時，當然更是腐敗不堪。在他議汰兵疏上面有幾句描寫當時兵伍情狀最痛快。他說：『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鬪爲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爲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崩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總之到嘉道之時，

不論滿兵漢兵，都腐敗透了，「吸鴉片，開賭場，」就是他們的職業；「勾盜賊，殺百姓，」就是他們的事功。

再談政治：專制時代的政治好壞，全憑皇帝一人的意志而決定，嘉慶是優柔寡斷的人，道光是很小謹微的人，都是中材以下的主子。嘉慶時常州人洪亮吉上書言時事，切中時弊，人爭傳誦，即嘉慶自己亦深知亮吉所言不錯，把他這篇書裝潢起來，常擺在自己旁邊，當作良規；但是對於洪亮吉卻始終不進用。這樣見賢而不能用，政治那裏能有起色？道光在歷史上很以儉德著稱，甚至他自己的服食器用，都不忍妄費一文錢，這確是中國史上不可多得之主；但是他在位三十年，吏治日偷，民生日困，卒釀成千古未有之奇恥大辱，其所以然的原因，我以爲在先係由於曹振鏞的逢迎，在後則由於穆彰阿的弄權，道光即位之初，曹振鏞即任首相，振鏞不學無術，而善於窺探人主的心意，以設法逢迎，當時道光不歡喜大臣進諫，振鏞乃向帝建議，教他將臣下所上的書札，無論所言何事，摘其中細微的錯誤，與文中破體字，懲戒一二人，臣下便要害怕而不敢多言了。道光聽從了他這個計策，以後果然沒有人敢輕於進諫，言路因之壅塞，人才更無從表見。道光十五年，曹振鏞死，

穆彰阿繼任，攬權怙勢，結黨營私，其妬賢害能，不減乾隆時的和珅。道光三十年中，有了這兩位禍國殃民的宰相，所以政治敗壞，民不聊生，內亂外患，接踵而來，幾乎把整個國家都斷送了，也是嘉道兩朝軍政腐敗的結果。

二 民間的變亂

嘉道兩朝，幾乎時時在變亂之中，其原因自然是官吏搜刮得太厲害，社會經濟破產，人民生計一天苦似一天，國內各民族都有些痛恨了，而清朝的軍政情形，又腐敗到那樣地步，統馭力已經是談不到了，漢族的民族思想，暗中便很活動。在下層社會裏結集了不少的小組織，或託宗教的名義，或託某某會的名義，而共通目標，則在恢復朱明。乾隆末年白蓮教徒劉之協奉了河南鹿邑地方的一個小孩子名王發生，誑說他是明朝的後裔，想拿他做一扇招牌，號召起事，後來這事敗露，發生被補，之協逃走，清政府很嚴厲的搜捕之，協和他的同黨，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各州縣，逐戶查緝，人民惶擾，牽連到幾千人之多。

嘉慶即位的第一年，散佈民間而深被壓迫的白蓮教，就大舉反清，這一次的規模很

大，各地起來響應的很多，其勢力蔓延到湖北、四川、陝西、甘肅、河南五省之地，清政府的軍隊，是不習勞苦，不受約束，七十里路要走兩天，而長官貪婪，冒領糧餉，又各處皆是，所以這次的變亂，竟費了九年的工夫，二萬萬兩的軍費，才算把牠平定。

北邊的白蓮教，固然鬧得清廷驚心動魄，手忙腳亂；而同時南方一帶的哥老會、三合會等異名同實的祕密結社，又到處皆是，其共通目標，都是要爲朱明復仇，他們有幾句誓詞：叫做「如天之長，如地之久，歷千萬年，必復此仇。」因此他們時時在那裏要想做復仇事業，後來孫中山組織興中會，三合會頭目鄭弼臣曾聯合起兵於惠州，哥老會會員亦多數加入革命軍，這是漢民族的變亂，此外回民之亂，苗民之亂，在道光一朝，就幾乎無一歲得安，最後乃積成太平天國與捻回諸大變亂，清廷得延殘喘，真是意外之事。

二二 外交的棘手

自乾隆時英使馬戛爾尼 (Macarthey) 斯當東 (George Staunton) 來中國要求傳教通商，未能成功，反受折辱回去了；到一八〇八年，嘉慶十三年英復派艦來華，欲佔領澳門，以

防範法國，保護中英、葡貿易爲詞，且願與中國協勦海賊，亦爲中國所拒絕。一八一四年，廣總督更奏定幾條禁例，以防開夷漢交通；但英國必欲在中國得一位置，免受貿易上種種箝制，因於一八一六年復派前印度總督亞墨哈斯（Amharst）爲專使來中國，期解決兩國的糾紛，確立通商的地位，乃又因見皇帝時禮節的問題，英使不願行叩頭禮，臨時稱病不到，嘉慶自以爲天下共主，英使臣如此倨傲侮慢，荒謬無理，嚴旨斥逐回國。自是之後，中英邦交日益惡化，識者早有隱憂了。果然，到了道光二十年，而有鴉片之戰。一戰之後，賠款失地，清廷一切弱點，都暴露無餘。凡前此以天朝自命的架子，都完全打翻了。人民生於這種極度腐敗政況之下，安得不喊着「官逼民反」呢。

四 世界民治思想的邁進

說也奇怪，這時中國境內固然是民族思想時，在那裏發動；同時世界民族思想，也欣欣向榮的澎湃着。一七八九年、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八年，是世界最有名的法蘭西三次大革命，經過這三次的革命，自由之神乃把自由種子，播散到全歐洲的各處，甚至全世界

的各處，各民族裏的自由之花，都開放得很美麗了。中美、南美的許多小國，是紛紛獨立了，歐洲的比利時也獨立了，波蘭、日耳曼、意大利，都在那裏做獨立運動和統一運動。奧大利、匈牙利，也在做他們激烈的革命運動，就是守舊的美國，也受潮流影響，而有擴充選舉權的運動。以上這許多事，大概都發生在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五〇年之間，正是我國嘉慶五年到道光三十年的時候。

其實中國此時人民思想，並未與西方相接，國內各民族的紛紛變動，也並不是受他們的影響；然而國內各民族，卻是前仆後繼的前進，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奇妙的事。大概此一時期，整個世界民治思想，都在那裏澎湃，所以中國民族也受自由之神的慫恿，在那裏應運而興，做他們的革命事業。曾國藩本是一個反潮流的人，只因爲那些所謂革命領袖，實際仍是充滿了帝王思想，並不明白什麼民治的意義，他們既未能成正果，所以就造成了曾國藩這樣一個時代英雄。

第二章 曾國藩的身世與家庭

曾國藩，字伯涵，後又改字滌生。他的先世，原是湖南衡陽的籍貫，到清朝初年，方由衡陽遷到湘鄉，遂爲湘鄉人。他祖父叫曾玉屏，號星岡。星岡有二子：長曰竹亭，就是國藩的父親。國藩幼時，最得祖父的撫愛，他生平立身爲人的基礎，多半得之於祖父；而曾氏家庭，也從他祖父手裏，才漸漸發揚起來。

曾氏由明代以來，世世業農，積善而不顯於世，星岡爲人篤實勤謹，勇於遷善。當他少年的時候，嘗歡喜同湘潭那裏一般闊少們吃酒閒蕩，酒吃醉了，就在酒樓裏酣睡，到次日早晨，太陽已出的很高了，他還酣臥未起。當時地方長老，有譏諷他的說：『此子如此輕薄，將來必覆其家。』星岡聽到了這話，立即自責，當時就把自己的馬賣了，徒步回到家中。自是遷善改過，刻苦耐勞，每日天未明即起，終身不曾倦怠。重農事，尚樸質，整理家務，凡事立定規模。此後國藩所談的治家教子，乃至修己治人之方，大多數都是發源於此。他嘗說：『余於起居飲食，按時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爲，庶幾不墜家風。』所謂家風，就是他祖父所建立的一切規模，他終身未嘗稍變。

據說曾國藩在二十歲以前，行動很不自檢點；雖然也讀書爲文，恐怕還是自古相傳

「文人無行」那一派的文人，與他後來立志學聖賢，完全是兩副面孔。當他二十一歲改字滌生時，曾痛責自己說道：「滌爲滌去舊染之汚，生如袁了凡所謂「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大概這是他翻然痛改前非的一個大紀念，對少年行徑，深自不滿；所以終身自待，非常嚴厲。看他自己的座右銘：「不爲聖賢，便爲禽獸；不問收穫，第問耕耘。」都可見到他確是二十歲以後才建築一個新生。就是學問方面，在二十歲左右，亦只是以詩文末技，著於鄉里；根本大道，都還沒有望見。到他二十五歲的時候，已經中過舉了，到京師去會試落第，從此卽在北京住了十六年。道光十五年這十六年，在他整個人生，佔極重要的地位。他生平的學問，最大多數是這時做成的；而京師爲人文會萃之區，他生平所得力的名師益友，亦多半是在此時結識的。此十六年，可以說是他修練時期，以後便是他應用時期，或者說是印證時期了。蓋自咸豐二年奔母喪後，他的生活，便從此不能安定；雖然後來戎馬倉皇之際，槍聲劍影之中，仍讀書爲學不改常度；但是要沒有以前那十六年切實修練的根柢，則以後成就不會有這麼大，卽處事接物，也不會有那樣從容裕如。所以我把他生平分做三個時期：二十歲以前，是他少年時期。四十二歲以前，咸豐二年會氏四十

二歲是他修練時期。四十二歲以後，是他事業時期。

國藩兄弟五人，他居長。次國潢，字澄侯；次國華，字溫甫；次國荃，字沅甫；國葆最少，字季洪。四個弟弟，都是國藩教導成人，至於顯達。後來國華與湘軍名將李續賓同陣亡於安徽三河。國葆佐國荃攻克安慶，積勞成疾，在圍攻南京時病歿。國荃以攻克南京成大功。國潢身體較弱，始終在家中料理家務。這是他們兄弟間的情形。

國藩有兩個兒子，五個女兒。長子紀澤，曾歷使英法俄諸國，官至戶部左侍郎，中西學術，都很不錯。次子紀鴻，頗精於數學，但是三十四歲就死了。他最小的一位女公子，就是今尚健在，而尤熱心社會事業的崇德老人。著有八十自訂年譜頗可參閱

國藩家庭，有極嚴肅的家風。——大部分是星岡公創立的，又經過他的增補，乃成爲曾氏家訓。關於星岡公所創製的家法，國藩把他歸納成功八字，三不信。八字就是「早，掃，考，寶，書，蔬，魚，豬。」早，就是家中無論何人都應該早起。掃，就是家中各處，每日都要掃得乾乾淨淨的。考，就是按時誠敬的祭祀祖先。寶，就是要待人寬厚，凡親族鄉里，應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問疾濟困，力所能及者，都應該盡量去做；因爲他祖父曾經告訴他，「人待人，無價

之寶也。」所以他就把這一類事歸納成功一個「寶」字。書、蔬、魚、豬，就是讀書、種菜、養魚、養豬。他在軍中，還由長沙親僱園丁，率領兵士於閒暇時種植菜蔬。他說：「蔬、菜、由手植，手摘，味道更好。凡一樣東西，自己累來的吃下去，心也是安的。」又說：「蔬、菜不茂盛，即家道衰亡之兆。」又謂施糞耕作，爲我家之祖訓。他不因爲地位高了，就看輕這一類事。又有所謂「三不信」就是不信地仙，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他均守之終身，不敢稍變。

此外他對家中子弟所諄諄告誡，令其勿墜家風者，就是要戒驕戒惰。大概官家子弟，最難免的就是這兩件事，而世家大族，所以由興隆而至於衰替，也全是由於這兩件事；因爲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稼穡艱難，養尊處優，左右前後，趨承供奉，無微不至；在這種環境之下，自非智識特達，器量過人者，安得不驕？安得不惰？他做了幾十年官，對這件事好像無時無刻不記在心頭。咸豐六年，他在江西正是軍事吃緊的時候，給紀鴻的信說：

「由家中來營者多稱汝之舉動，可爲成人，聽之稍慰。凡人多願子孫爲大官，予不願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此君子也。予在官二十年，不敢染官宦之氣習，飲食起居，尙守寒素之家風，極儉亦可也，略豐亦可也，太豐我不敢也。凡仕

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與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怠倦，未有不敗。爾讀書識字，不可有間斷，早晨要早起，決勿墮高曾祖考傳來之家風。吾父祖黎明起床，汝知之乎？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命；惟學爲聖賢，全由自己作主，與天命不相干涉。爾宜舉止端莊，不妄發言語，則入德之基也。」

這一類意思，在他家書和日記中，觸目皆可見到。

驕惰的對面就是勤儉。大概驕則必至於奢，奢則不能返儉；惰則不求奮發有爲，勢必至於淫而忘善；於是他爲驕惰這兩種病，下兩種藥方，就是勤儉。能勤儉自然就不會驕惰。他更進一步替他們訂出具體的課程，使日日爲之而不斷，自然就會到勤儉的地步，而不至於蹈驕惰的惡習。他說：「吾家男子，於「看讀寫作」四字缺一不可；婦女於「衣食粗細」四字缺一不可。」

看就是看書，讀就是讀書，寫就是寫字，作就是做詩文。凡須熟讀精思的讀物，都是他所謂讀的範圍。凡不須熟讀精思，只須一眼看過的，都在他看的範圍之內。他說：「讀書非

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咏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二者不可偏廢。『寫字就是練習各體字，如真字、行書、篆字、隸字，一日不可間斷。他說：『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他叫人要練習到每日能寫一萬個真字，就差不多了。做文他說要在二三十歲時，立定規模，三十歲後，則長進極難。又說：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爲之，則後此將不肯爲了。這是他家男子的功課。

婦女的功課，據崇德老人八十自訂年譜云：同治七年三月，由湘東下，至江寧，入居新督署，文正公爲余輩訂功課單如左：

早飯後

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

食事

巳午刻

紡花或績麻

衣事

中飯後

做針帶刺繡之類

細工

酉刻

過二更後

做男鞋女鞋或縫衣

粗工

在這課程單之後，又附註云：『吾家男子於看讀寫作四字缺一不可，婦女於衣食粗細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訓數年，總未做出一定規矩。自後每日立定功課，吾親自驗功，食事則每日驗一次，衣事則三日驗一次，紡者驗線子，績者驗鵝蛋，紡紗積成鵝蛋形也，細工則五日驗一次，粗工則每月驗一次。每月須做成男鞋一雙，女鞋不驗。』最後又云：『家勤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永不貧賤。』

照這樣看來，他家的男子女子，都沒有一時閒空，自然用不着去想法子消遣，自然不會走到驕惰那條路上。我們再轉過來想想，一個兩江總督的家庭，其勤儉乃至於如此，青年處於國難日深，任重道遠的今日，宜如何加倍勤勞，加倍節儉，才够得上做一個現代的國民！

第三章 會國藩之進用

會國藩以漢人資格，立於多疑多忌的滿洲朝廷，其危險之象，正如波濤洶湧的海洋上面，飄蕩着一隻小帆船，時時有顛覆的可能；然而他居然未顛覆，平安地達到他的目的。

地，而成清室中興惟一的人物，不能不佩服他的駕駛方法了。

當咸豐二年以前，國藩在京十幾年，雖然也做了些雜職；什麼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侍講學士，文淵閣直閣校理，乃至禮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都是進士之後例有的職務。痛快點說，這些職務，都不過是替皇家當差罷了。咸豐二年，國藩母親死了，由京請假回里治喪，在家不多時，而太平軍起，國藩奉朝廷命，幫同辦理家鄉團練；起初不過是搜查土匪，保衛地方，自己也決沒想到由這個出發點，而建立那麼大的功業。

自嘉慶以來，各省時有變亂，官兵的靠不住，既如第一章所云，各省爲了自衛起見，都紛紛訓練鄉勇。像道光時平定川陝教黨，就全是鄉勇之功。太平軍起，湖南首當其衝，湘鄉有幾位貧苦的書生羅澤南等，在家鄉辦團練，還有些成績。到咸豐二年，太平軍勢漸盛了。清廷值鴉片之役戰敗之餘，要調兵吧，是沒有靠得住的兵；要遣將吧，看看滿洲一般親貴，又沒有一個可當大任，不得已才命國藩就近辦團練。國藩本是書生，沒有學過軍事，又在母喪之中，所以對政府的命令，就推辭了。當時國藩的朋友郭嵩燾和國藩說：『你平常不是有澄清天下的志願嗎？現在有這大好時機，你不乘時而出，拘守古禮，有什麼益處？況且

帶孝從軍，也是古人常有的事，你何必固執呢？」其弟國荃亦很勸他，他於是決意出任團練的事。

羅澤南他們起先所辦的團練，雖然也有些成績，但是究竟缺乏訓練。當時土寇蜂起，兵勇俱不能抵抗。當時官兵稱兵鄉團稱勇自從國藩出來，首主嚴明，而以岳武穆「不愛錢，不怕死」二語自勵，凡士卒不遵守營規的，一律軍法從事。自他任事一百天之中，竟殺了二百多人，一時大爲驚懼，都覺得國藩太厲害了；甚至送他一個綽號叫做「曾剃頭」。——就是說他好殺人的意思；但是國藩毫無顧忌的向前幹去，湘團遂成爲勁旅。這一點精神，和這一點成績，乃爲戡平大亂的根柢。

國藩治兵的主張，惟在誠樸二字。他是要將之以忠義之氣，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勸，而後言戰。故其所練水陸各軍，必擇官紳中忠誠有肝膽者以爲之將，就是募選兵勇，亦是如此。他說：「爲兵勇者，以年少強有力樸實具農民之氣者爲上，油頭滑面有市井及衙門氣者，概不收用。」他自己又真能不愛錢不怕死，總算是坦然大公，足以挽回當時腐敗偷惰的陋習，事體應該可以順利進行了；而事實上乃大大的不然。自從湘軍成立之後，一

般無知無識的滿洲將吏，及綠營諸人，初則多方藐視，後來見湘軍打起仗來，卻確實有些厲害，於是又由藐視而變爲嫉妬，湘軍初起於長沙，故長沙官兵，尤爲嫉視，兵士則對湘勇私鬪，軍官則處處掣肘，不肯聽國藩之命，似乎與國藩取不合作主義，大家抱着手，要在旁邊來看這位迂夫子帶兵的笑話。當時有一位滿洲人塔齊布，不過做一個小小的都司，清四品武官，職位甚卑，曾幫同國藩治軍，而一般滿洲人，還要罵他詭媚。有一次塔齊布所教練的辰州鄉勇，與永順官兵私鬪，永順兵乃列隊以討辰州鄉勇。國藩感覺長此互相水火，不但事功無成，並且要失去朝廷的威信。於是寫封信給湖南提督，當時全省最高武官提督把這些亂兵，一個個網起來送給國藩，任他處治。國藩還沒有處治，而永順營兵已大隊來把國藩住處包圍起來，不由分說的，衝進來殺傷國藩的兵士，國藩自己也幾乎受傷，全省文武長官，沒有辦法，國藩部下主張把這件事報告朝廷，國藩說：『大亂未平，何忍私鬧意見，我們避之好了。』乃即日移駐衡州。

這是在下面的一般滿洲武將，和腐敗官兵，嫉妬湘軍，破壞不遺餘力的一例。照此一類的事，在當時真是多極了。看國藩給王鑫音珍的書，就憤恨的說道：

『近世之兵，屢怯極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於禦賊，而勇於擾民，仁心以媚殺己之賊，而很心以仇勝己之兵勇。其仇勇也，更甚於仇兵。近者兵丁殺害壯勇之案，層見迭出。且無論其公相仇殺，即各勇與賊戰殷殷之際，而各兵不一相救，此區區之勇，欲求其成功，其可得耶？』

當時兵士是如此妒功忌能，助敵造亂，就可知國藩處境之難了。

不但如此，朝廷裏面還有一部分漢人也在那裏嫉妒國藩。時在咸豐面前說國藩的壞話呢！其中以祁雋藻、翁心存兩大學士，與國藩齟齬得最厲害。祁雋藻是山西壽陽人，嘉慶十九年進士；翁心存是江蘇常熟人，道光二年進士；國藩爲道光十八年進士，比之於他們兩位，自然是後輩了。而祁雋藻在當時，尤自負老成碩望，三代元勳，故對此新進少年，居然建立大功，心中不免難過；所以在咸豐面前傾軋國藩，亦無所不用其極。嘗謂：『國藩以匹夫居鄉里，一呼而從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這句話真是動聽極了。換句話說：就是國藩這樣下去，說不定會造反呢。然而咸豐表面上卻始終不聽他這句話，對國藩任用亦始終不衰。我以為此中有兩層原因：（一）太平軍勢力已瀰漫全國，而滿族中又無一人

可用，故不得信任國藩。(二)文慶、肅順二人，在咸豐左右，亦有很大影響。文慶爲滿洲大學士，在內閣，嘗密請破除滿漢界限，不拘用人資格。他說：『欲辦天下大事，必須重用漢人，彼皆來自田間，知民間疾苦，熟察情偽，豈若吾輩未出國門一步，嘗然於大計者乎？』肅順亦滿洲人，在當時驕恣暴戾，人皆切齒罵之；但是他對漢人倒十分信仰，凡他貪贓受賄，都是對滿人爲然，至於漢人，雖一絲一粟，他都不敢要。他常同人說：『滿族中無一人可用，國家遇有大疑難事，非倚重漢人不可。』他與文慶在咸豐左右，常稱贊會國藩之識量，胡林翼之才略。當時會國藩、胡林翼之握兵柄，多半是肅順的力量。因此雖有祁寯藻、翁心存等傾陷，而咸豐之意，不爲之動。

但是咸豐之意，能絲毫不爲動麼？這又未必然了。我們看國藩用兵七八年，時時受人牽制，處處不能指揮裕如，就是因爲他沒有確實的名義，事權不專的原故。他雖然轉戰於兩湖、江、皖數省之地，用的都只是兵部侍郎的名義，與地方大吏，顯然有主客之分；所以地方軍隊，他不能直接指揮，地方軍隊反敢以主制客，與他爲難。清廷既希望他負平亂大任，爲什麼不給他一個事權專一的名義呢？我以爲一方面清廷自以爲江蘇有江南大營，江

北大營數十萬衆在滿人手裏，未必專靠國藩戡平大亂；另一方面或者祁雋藻那句話，也未嘗不有些效力。他們心裏想，不要真弄到「非國家之福」的地步，就悔之無及了。因此國藩雖然每次打了勝仗，清廷總是拿「調度有方，交部從優議敘」幾句空話來安慰他，從未敢以實權相予。後來江北大營、江南大營都被太平軍平滅了，兩江總督何桂清遁走，江蘇巡撫徐有壬、浙江巡撫羅遵殿都死於難。清廷真正毫無倚仗，眼見東南大局，土崩瓦解了。這才於咸豐十年六月，詔授曾國藩爲兩江總督，並命爲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從此事權歸一，國藩乃保薦左宗棠專任浙事，李鴻章專任蘇事，曾國荃圍攻安慶，而胡林翼撫湖北，沈葆楨撫江西，晏端書謀餉粵東，皆聯絡一氣，呼應靈敏，三年之內，大難乃平。就可知從前疑忌國藩，正不知耽誤了多少事機，犧牲了多少生命！

然而清廷對國藩，始終總有些放心不下，在他功成之後，論功行賞的時候，格外表現得明白。當咸豐臨死，曾告訴諸臣，將來誰能克復金陵，當封以王爵。湘軍既克復金陵，而朝廷則以國藩非滿人，封王爲舊制所無，因封爲一等侯爵。其實漢人封王，何嘗爲舊制所無？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不都是封王的嗎？大概此時清廷心裏感覺漢人究竟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不要再弄出吳三桂的那一轍，到此時就真無辦法了。再想想祁寯藻的兩句話，到真是老成持重呢！故終不敢踐咸豐之言，即始終對國藩未免於疑忌。猶幸國藩謙恭謹慎，毫不矜伐，朝廷每次封賞，必再四推辭，不克，然後乃受；因此才得善始善終。國藩平時每喜以「花未全開月未圓」的氣象勸勵家中子弟，我以為這一句就是他處世哲學；他所以能功成名就，不現一點痕跡，全得力於這個處世哲學。我所謂不能不佩服他的駕駛方法，亦正是指此。

第四章 平定太平天國

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有一次極大的內亂，全國人民幾乎無不受其蹂躪，清廷亦幾乎被其推倒，這便是老年人所說的「長毛造反」。

「長毛」就是當時的革命黨，他們反對清朝那種宰制漢人的剃髮制度，所以把頭髮全蓄起來，世俗就給他們起個綽號叫做「長毛」。裏面的主要袖領，要算洪秀全與楊秀清，故史書上稱爲洪楊之役。太平天國，是他們所用的國號。

洪楊之役，起於民國前六十二年，清道光三十年止於民國前四十八年，清同治三年前後凡十五

年，蔓延至十六省，歷清廷道光、咸豐、同治三朝，此時清廷軍政的腐敗，武事的廢弛，人民的窮困，已略述於第一章。一般滿洲大吏，猶日以貪贓枉法，妒賢害能爲事，一旦洪楊事起，內外大吏，類皆昏聩糊塗，莫知所措；若非後來曾國藩率領一班書生，崛起田間，運其知人善任之明，堅其百折不回之志，不畏毀譽，不避艱難，苦心孤詣來埋頭苦幹，則清廷統制權，亡之久矣。

先是兩廣一帶，連年荒旱，官吏更殘酷搜刮，粉飾太平，人民水深火熱，無以爲生，而苛捐雜稅，猶不稍寬假。是時祕密黨社，已徧佈全國，皆以「滅清復明」相號召，於是廣西一帶人民，紛紛打着「官逼民反」的旗子，相聚爲盜，到處殺人劫財，無惡不作。廣西巡撫鄭祖琛，老朽昏庸，因循畏事，惟恐被朝廷知道他所管治的地方出了亂事，他要受處分；故雖盜匪四起，猶竭力隱瞞，不使朝廷知道，而自己又沒有維持消弭的能力；良民迫於自衛，乃創立團練，而祕密社會之黨員，復乘機混入，往往操縱團丁，造成革命勢力。洪秀全等乃利用此時機，樹起革命的旗幟。

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人，幼年家境窮苦，天質聰慧；及長，信基督教，創上帝會，謂「耶和華爲天兄，而洪秀全爲上帝之次子，奉天父天兄之命，統治人類，除去惡魔，洗滌惡罪，拯救世人。」其最先入上帝會者，爲秀全同鄉馮雲山。雲山亦讀書懷大志，遂與秀全相結，後來上帝會聲勢漸漸浩大，乃起兵於廣西桂平之金田村，其地在大藤峽，居萬山之中，盤薄六百里，地稱天險。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秦日昌等佐之，收羅各會黨亡命，與各處匪盜。一時惡少年聞風響應，秀全等更以宗教迷信之力，團結愚衆，謂戰死則登仙界。一般愚民以爲進攻則可以姦淫擄掠，戰死則可以早登仙界，故皆輕死相從。秀全等既據有天然險要，又假迷信之力，統率一般慙不畏死之愚衆，是以所向皆克，官軍竟無從抵禦。是時廣西提督向榮，副都統烏蘭泰，二人常鬧意見，對太平軍，則互相觀望，乃給太平軍以從容佈置的機會。

太平軍雖佔有上述這種種便利，亦未能完全收集兩廣匪盜，成一嚴密組織；遂於咸豐二年二月，率其老弱不滿萬人，由廣西入湖南，以求向外發展。是時湖南官兵久疲，又值湘水正漲之時，太平軍順湘水而長驅直上，江忠源、羅澤南、王鑫等以地方團練，在長沙與

太平軍相持，向榮亦自桂林追至，大戰三月，長沙未破，太平軍乃夜造浮橋，渡湘而西，破益陽，渡洞庭，大破岳州，盡得岳州城內舊藏軍械，又奪民船五千艘，順流而下，遂陷漢陽。漢陽在當時爲數省通衢，百貨山積，太平軍焚掠五晝夜，又陷武昌。此時太平軍已有衆五十萬，船逾萬隻，盡載其金銀米糧軍械布帛貴重之物，蔽江而東，官兵望風而逃遁，太平軍直陷九江、安慶、蕪湖、太平，而定都於南京。

太平軍自道光三十年起兵，至是

咸豐三年

不上三年，竟能出廣西，走湖南，破湖北，歷江西、

安徽而入江蘇，橫行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其於攻下之諸城，除收掠財貨兵器，招納會匪無賴而外，未嘗分兵固守，完全是流寇的性質。定都南京之後，乃爲北伐之計。一路由鎮江陷揚州，出皖北，經臨淮、鳳陽，而入河南，攻山西以襲京師。一路則沿江而上，經安徽之太平、蕪湖、安慶攻江西以爭長江上游。又一路則東下規畫蘇常，以取東南財富。

是時清朝主力軍隊，則有欽差大臣琦善所統直隸河南陝西黑龍江馬步各兵，由河南馳抵揚州，號爲江北大營。向榮由廣西追太平軍至江寧，屯孝陵衛，號江南大營。聲勢頗爲壯盛，然而戰鬪力則異常薄弱，終不足以抵抗太平軍之勢，其爲太平軍之勁敵，而太平

軍終爲平滅者，則曾國藩所領導的湘軍之力。湘軍是曾國藩由郭松燾等所練鄉團擴充成功的，內中領導人才，全是書生，士兵則全是農夫。書生故無官場習氣，農夫故無營混子的習氣。湘軍所以能平大難全，得力於此，湘軍靈魂之寄托，亦全在於此。

曾國藩起初本是以鄉人資格，站在保衛鄉土的立場上，爲家鄉努力。清廷眼見太平軍所過之地，莫不風捲殘雲，而長沙一處，獨安然無恙，始命曾國藩以在籍侍郎資格，募爲官勇，出境剿敵。國藩乃擴充鄉勇而爲湘軍，令羅澤南、王鑫、塔齊布，及其弟國葆等分將之。翌年^{咸豐三年}，又用江忠源、郭嵩燾等所建水攻之策，購造兵船，編成水師，以楊岳斌、彭玉麟等分統之。自是湘軍水陸師皆完備，遂爲太平軍之勁敵。

雖然，自今日觀之，曾國藩以漢人資格，去助清廷爲虐，以殲殺太平軍，似乎也太缺乏革命性了；其實曾氏與太平軍之不相容，卻另有見地。在他討太平軍檄文中有一段，謂：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敍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

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爲之所也？」

這是曾氏與太平軍根本抵觸的所在，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宗教戰爭。所以他始終不懈，爲的就是要保持名教，恐怕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這是曾氏的心跡。是故湘軍初起之時，祇在保衛鄉土，後來便在保持名教。

太平軍自定都南京之後，便漸漸腐化起來，諸王爭權奪利，互相殺戮，雖云三路進兵，但是組織不嚴密，呼應不靈活，北路軍乃漸爲清軍所敗，主將都被擒而死。東路軍佔有今之滬寧、滬杭兩路之地。西路軍則與湘軍爲正面衝突，精銳之師，亦多集中於西路。咸豐三年，先攻安徽桐城，破集賢關，再陷安慶，攻九江、湖口，進圍南昌，又快要到湖南境地了。是時正值曾國藩整飭鄉團，奉命出境剿敵，乃派郭嵩燾、羅澤南等，率湘軍會同江忠源攻太平軍，南昌之圍始解。然太平軍此時軍勢最盛，乃由南昌折回，沿長江而上，黃州、武漢等處，望

風瓦解，國藩自率水陸師由長沙北進應援，大敗於靖港，又敗於湖口，國藩憤欲自殺，名將塔齊布、羅澤南皆先後陣亡。後來曾國華又爲陳玉成大敗於廬州三河，曾國華及諸弁員死者六千人，湘軍精銳，殲滅殆盡，而江南大營、江北大營，又爲太平軍所平。清廷這才着了慌，詔授曾國藩爲兩江總督，是時安慶以下還在太平軍手裏，國藩乃帶着軍隊駐安徽南部之祁門。太平軍分三路圍攻祁門，有人勸國藩退兵，國藩懸劍帳外，說：『去此一步無死所。』堅守數十日，左宗棠擊退太平軍於樂平，乃通贛皖運輸之道，而曾國荃亦大破陳玉成於安慶，於是重整師旅爲收復金陵之計。

同治三年六月，曾國荃破金陵，戮洪秀全屍，太平將士三千餘人皆戰死，軍民十餘萬人爭蹈河死，屍堆積如橋，城郭宮室連燒三日不絕。是時李鴻章先後復常州、蘇州、江陰、吳江、崑山、太倉等地，左宗棠收復浙江、洪楊之役，至是始告結束。

第五章 曾國藩的政治

清季政治的腐敗，已在第一章中述其梗概；因爲政治的腐敗，故激成民變。用武力把

亂事平定了，假如沒有良好的政治，以繼其後，終不足以服人心而平亂源。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的時候，就是武力、政治雙方並用。武力以除暴，政治以安良；故當亂事還未平定，他便很注意於澄清政治。蓋政治果清明了，其效力且在武力之上；惟是要想做到一個理想的政治，必有理想的人才。而在當時政治腐敗之餘，大亂方定之日，必得真心爲民的循吏人才，當然尤不可多見，而欲掃除一世的貪污，不更難若登天嗎？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的政術，似乎是分三個部份去進行。整飭吏治是中心，作育人才是方法，變易風俗是最後的目標。茲分項述之：

一 整飭吏治

曾氏整飭吏治的綱領，勸誡州縣的四條是：

『治署內以端本，明刑罰以清訟，重農事以厚生，崇儉樸以養廉。』

勸誡委員的四條是：

『習勤勞以盡職，崇儉約以養廉，勤學問以廣才，戒傲惰以正俗。』

每條下面均有淺顯明白警醒動人的說明，印成小冊，分散各州縣官，與各委員。自今日觀之，也算是當時一種新生活運動；不過他是完全責成地方長官，叫他們要以身作則，處處給百姓做個模範。他在「戒傲惰以正俗」那一條下面，有這幾句：『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積久遂成風俗。一人自是，將舉國予聖自雄矣；一人晏起，將舉國俾晝作夜矣。今與諸君約：多做實事，少說大話，有勞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則勳業自此出，風俗自此正，人材亦自此盛矣。』

地方長官果能以身作則，多做實事，少說大話，人民自然可以相習成風，社會自可安定。原來中國人民，最富可塑性，遇到良好的領袖，他們就可以變成良好國民；遇不到良好領袖，使他們顛沛流離，他們也會挺而走險，供少數人做犧牲品。曾氏以州縣官爲整飭吏治的最小單位，確是千古不可變易的準則。

這是他手定的整飭規模；但是如何能使州縣官遵從實行呢？所以須要他那嚴明的察吏方法。他說：『蒞事之始，其察之也不嫌過多，其發之也不宜過驟，務求平心靜氣，考核精詳，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將司役之尤無良者，痛懲一二輩。袁簡齋云：「多其

察，少其發。」僕更加一語云「酷其罰。」三者並至，自然人知做懼，可望振興。」這幾句話，可算他整飭吏治的一個手段。他所謂酷其罰，有一段故事，很可以做個證據。他部下有一位副將李金暘，年未三十，勇悍絕倫，嘗戰敗，陷賊中，繼而逃歸；李部下營長某，控告李通賊，二人同解至曾處。曾力辨李冤，謂營官告誣統領上司，判卽正法。是日李來謁曾，盛稱中堂明見萬里，感激至於泣下。忽而曾又傳令說：『李金暘雖非通賊，既打敗戰，亦有應得之罪。』卽派親兵綁去處斬，聞者無不駭愕。手段之辣，至於如此，真可謂酷其罰了。

最奇怪的，就是他手段雖然如此嚴酷；但是凡在他部下的，莫不死心塌地的感念他。不止受他提拔的人，固然是感念他；就是受他參劾的人，也感念無已。李元度曾兩次被國藩參劾，因此一生不得志；但是國藩歿後，元度的輓詩云：

『記入元戎幕，吳西又皖東；追隨憂患日，生死笑談中。末路時多故，前期我負公。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

此可想像曾氏對僚屬的魔力了。他怎樣會有這種魔力呢？我以為是得力於他那種作育人才的精神。

一一 作育人才

曾氏生平最大長處，在知人善任；因爲知人善任，故能收羅各方面的人才，以成其不世功業。他面前的人才，有兩方面的來路：一是就現有人才中，破除資格，破除成例，予以不次的拔擢。一是由他自己訓練出來人才，然後予以相當的職分，責以相當的功績，又時時予以獎勵勸誡。是以各項人才，都樂爲之用。當江忠源未顯達時，到京城去拜見國藩，臨去，國藩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稱。』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曾國藩部下，曾奏稱其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後來經營軍事，皆賴其助。他如楊岳斌、塔齊布、鮑超是自營伍中提拔出來的；羅澤南、李續賓、王鑫、彭玉麟，是自書生中提拔出來的；均以至誠相與，使各盡其所長。最後派劉松山一軍入關，拔之列將之中，謂可獨當一面，卒能揚威秦隴，功勳卓著。又如李鴻章、左宗棠、郭松燾、李元度、李鶴章、劉長佑等，都曾經過他的獎拔裁成，這都是我所謂就現有人才之中，提拔出來的一路。其次就是由他自己訓練出來的，大抵由勉強磨練而成，他自己生平才學，全得力於勉強磨練，故其取人，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

有一技之長的，無不備加獎勵，量才錄用，將吏來謁，無不立時接見，殷勤訓誨；或遇難辦之事，無不予以幫助，有師長教導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此可見其憐惜人才，與練訓人才的至意了。

他所希望的吏治人才，是要武能戢暴，文能安良，而又公正廉明，勤儉樸實。他所訓練的人才，都是按着這個目標去做。原來廉明二字，本是做好官的祕訣，而亦是立身爲人之本。要做到廉明，便須勤儉；凡他告誡屬員的書札批牘，總是拿廉明二字相勉勵。他說：『勤能生明，儉能養廉。』這是他理想的吏治人才。這種理想的人才，當然不容易有現成的，他也決不願意從原有官吏中提取，爲其已有官場習氣，一時總不易洗刷乾淨。他要從一般「寒士」「書生」訓練成功的循吏，無論做至何等大官，始終不失寒士書生的本色，而又服膺勤儉廉明之義的，然後才能負起整頓地方的重任。

他生平處事接物，最服膺一個「誠」字；教人的方法，取人的標準，都不出一個誠字。這一個誠字，就是曾氏能服衆的根本學問，他所以能收羅各項人才，靠的是此術；所以能澄清當時政治，而成一新興局面，也無非是靠的此術。

三 變易風俗

風俗與政治，有互爲因果的關係；因爲政治腐敗，故風俗日益澆漓；風俗澆漓，自然亦不容易產生出良好的政治。但是當風俗十分澆漓，不易產生良好政治的時候，必須賢明政府努力倡導良好政治，然後可以移風易俗。是以風俗與政治表面上雖然是有連環性，而曾氏則重在上位者的倡導。他嘗說：『風俗之正否，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爲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且廣也。』故政治而不能改變澆風，就見得這政治力量，還未能及於民衆；這政治也就未能達到良好的境地。再進一步說：就是政治還未能得到適當的人才。所以他是以作育人才爲澄清政治的方法，而以變易風俗爲政治的最後目標。

在他澄清政治的方法之中，還有一個根本方法，就是勸學。勸學的方向有二：一是勸官吏學，一是勸地方人士學。官吏時時有一副學習的態度，自然虛心求治，不至貪贓枉法；地方人士都能潛心向學，則地方正氣日長，邪曲小人，無從立足，鄉里間自然不會發生亂

事。推而言之，一國之中，苟其上上下下，都能有虛心學習的態度，則不但可以變易風俗，使風俗敦厚，且可淬勵人才，使人才輩出。他說：『風俗之美惡，主持在縣官，轉移則在士紳。欲厚風俗，不得不培養人才。』他在直隸做總督時，曾立三科以求賢士：凡孝友爲宗族所信，睦婣爲親黨所信者，是爲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擔當難事，出財以襄成善舉者，是爲有才之科。凡工於文字詩賦，長於經解策論者，是爲有學之科。他立了這三科標準，便令各州縣依照標準採訪保舉，一縣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其全無所舉，及舉而不實的，都要受記過的處分。他說：『每州每縣皆有數人爲大吏所知，則正氣可以漸伸，奸宄因而斂跡。端本善俗，尤在於此。』

他如此做法，其結果雖然未能如他理想所期，但是大難方平之後，使地方恢復原狀，人民安居樂業，以及同治年間政治上一點新機，卻未嘗不是他這政術的反應。

第六章 新政的成績

內亂平定了，地方秩序漸漸恢復原狀了，曾國藩的意思就想替中國做些革命事業。

原來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接着又是英法聯軍入京，彼時凡與外人接觸，沒有一次不是大吃其虧。國中賢士，已很有些覺悟，知道中國確有不如人的地方。曾國藩在江西時，已感覺外人的輪船槍礮的厲害，他自己的軍營中運送軍火，就常用小輪拖送。後來李鴻章利用西人洋槍隊常勝軍，以平定太平天國，就更覺西人的堅甲利兵輪船機器爲其富強之源，頗有起而仿效的心願。故曾氏嘗云：『欲求自強之道，終以修政事，求賢才爲急務，以學作炸礮，學造輪舟爲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具。』是時與外人交涉日益頻繁，政府迫於環境，乃於民國前四十九年，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創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辦洋務。——後演進爲今日之外交部。自是之後，「洋務」二字，遂爲識時之士的時髦名詞。

然而同時又有一個矛盾現象：就是一面高唱洋務，一面又拒絕洋務。這拒絕洋務的分子，自然一般滿洲大吏爲先鋒隊。當時所謂先覺之士，在朝則有恭親王奕訢，在外則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而曾李等所倡行新政，尤多得力於恭親王之贊助。然自今日觀之，彼時所謂先覺之士，似亦未免有此矛盾現象；是以所倡辦者，猶甚幼稚，而未能澈底。這

矛盾現象的來源，是由於數千年來惟我獨尊的傳統積習。蓋自古以來，中國四境的國家，其文化國力，皆遠不如我；數千年來，類皆服屬於我，朝貢於我，無形中遂養成了妄自尊大的國民性，鄰國均爲戎狄蠻夷；今一旦要去倣效夷人，崇拜夷人，當然要發生許多不平的心理。由這不平的心理，遂生出兩種結果：一是虛驕，一是怠惰。一面感覺中國確有革新的需要，一面心目中又牢固着這種虛驕怠惰的氣燄，中國遂永久在十字街頭過生活；雖至今日，好像還在那裏徬徨着。

然而我們退一步想，以彼時彼地的眼光衡量他們，則曾李等所倡的洋務，雖然很膚淺幼稚，畢竟要算識時之士。他們把自己不如人而應倣效人的地方，竭忠盡智一點一滴的去幹，儘管大家譏笑反對，他們仍是埋頭去幹。咸豐四年，曾國藩便設礮局，倣製西洋水雷，雖然沒有什麼效果，卻見得他當時的意志。到了同治初年，他便派容閔到美國去買機器，同治四年，乃創立江南製造局於上海，製造槍礮及輪船。李鴻章亦於是年請在廣東等處海口設局，雇用西洋工匠，製造船礮。次年左宗棠又籌設馬尾船政局於福建。

此時他們雖然略知外情，認識洋人的船堅礮利，而極力從事倣倣；但中外國情，既因

語言文字之隔闕而莫由通曉；而官員紳士之中，又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外國公使領事，均有譯員，而中國惟有通事傳語。其時之通事，類如今日之西崽，僅能通習洋語；縱有略識洋字者，亦不過貨名價目，與淺俗之文，談不到吸收他們的學術思想。因是政府於同治元年，創設同文館於北京，專以學習各國語言文字爲務。先從八旗中挑選年在十五歲左右之學生十名，教以漢文英語。次年又添設俄文法文二館，每館學生十名。是時李鴻章請於上海創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清廷許之。廣州亦設學館，學生畢業，則送往北京同文館肄業。清廷又以左宗棠之建議，將同文館添設一館，考收滿漢舉人等，學習天文算學，爲製造機器輪船之本。凡年在三十以內之翰林院庶吉士，編修、檢討，及五品以下由進士出身之京內外各官，均得應考入館，發給原薪。其時大學士倭仁等極力反對。倭仁奏稱『立國之道，尙禮義不尙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爲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後來清廷因旱求言，有楊廷熙者，奏請撤消同文館，以塞天變。沈葆楨在福建辦船廠，輪船已成三號，而內閣學士宋晉以製造糜費太重，奏請停止製造。

裁撤船廠。幸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極力主張，始得繼續，此可見當時頑固守舊分子，反對新政之劇烈，與新政進展之困難了。

民國前十四年，一八六七年同治八年曾國藩容納容閎的意見，於江南製造局附設機器學堂，

以養成工程人才；馬尾船廠，亦開學堂二所，選幼童分習駕駛製造諸藝。其後李鴻章亦於天津創設電報學堂、武備學堂、水師學堂。同治十年，曾國藩又用容閎的計畫，奏派幼童出洋學習軍政、船政、製造諸學科，每年選幼童三十名往美國肄業。李鴻章、沈葆楨亦派遣學生到西洋各國學習軍事、製造等科。

此時諸賢之所倡導者，多注重在堅甲利兵的一點。於是與堅甲利兵有連帶關係者，則爲鐵路與電綫。鐵路始於民國前三十六年，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英商所建築上海吳淞間之輕便

鐵路，次年完工營業，乘客擁擠，而紳士恥之。不久火車壓死一人，清廷多方交涉，出款二十八萬兩贖回，是時丁日昌奉命到臺灣試辦鐵路電報，乃將淞滬鐵路拆毀，送至臺灣，其一部分材料，成爲廢物，臺灣鐵路亦未能成。後由劉銘傳辦理，始告成功。銘傳嘗請建築二路：一自清江至北京，後改自浦口至北京一自漢口至北京，雖李鴻章極力贊助，亦以官紳反對而未實行。

至民國前二十九年，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李氏爲開平煤礦便利運輸之計，築成唐山至胥各莊鐵路二十里，是爲中國自築鐵路之始。

中國之有電報，蓋始於民國前四十一年，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丹麥商人所組織之大北公司，敷

設海線，自香港至上海，言明不得於岸上設線。及吳淞鐵路築成，鐵路公司於路傍設線，直達上海，後來鐵路收回，與公司交涉，令將路傍電線拆去，公司遷延不肯，乃由中國收回。民國前三十一年，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自大沽口至天津，架設電線，是爲中國自辦電報之始。次年，乃創

電報學堂，僱用丹麥人教授，自是中國電報事業，乃日益旺盛。

以上所舉之新興事業，爲當時最著之數種；此外如海關之改組，煤礦的開採，各種學校的興辦，不一而足。雖當時反對洋務者，上下皆然，而曾李等苦心孤詣，卒建築成功。近代新事業的基礎，可惜後起的人，未能把他們的事業，發揚光大，甚至把他們那點基礎，還踟喪了許多，而又掉轉過來譏笑曾李等見識短小，真未免太易其言了。

當時所辦的洋務，自表面看來，自然大家要歸功於李鴻章、左宗棠、劉銘傳一輩人；以爲曾國藩在當時，已成過去的人才了。不知當時所倡辦的新政，許多是國藩親自倡辦的，

許多是幕府僚屬秉承國藩之志而行的。即如郭嵩燾、薛福成、曾紀澤皆歷使各國，爲外交上老前輩；但此三人者，都是國藩培植成功的，茲錄庚子西狩叢談裏的一段故事：

『公（李鴻章）又曰：別人都曉得我前半部功名事業，是老師（指曾氏）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老師一言指示之力。從前我老師從北洋調到南洋，我來接替北洋，當然要先去拜謁請教的。老師見面之後，不待開口，就先向我問道：「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衝要關鍵，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方協以謀我，我小有錯誤，即貽害大局，你與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義呢？」我道：「門生只是爲此特來請教。」老師道：「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義，且先說與我聽。」我道：「門生也沒有打算什麼主義，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只同他打屁子腔。」皖中土語即油腔滑調之意

『老師乃以五指捋鬚，良久不語，徐啓口曰：「呵，屁子腔，屁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

『我想不對，老師一定不以爲然，急忙改口曰：「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

教。」他又捋鬚不已，久久始以目視我曰：「依我看來，還是用一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儘如何虛強造作，他已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佔到便宜，也或不至過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分，總是站得住的，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至過遠，想來比屁子腔總靠得住一點……」我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我心中頓然有了把握，急忙應聲曰：「是！門生準奉老師訓示辦理。」後來辦理交涉，不論英、俄、德、法，我只捧着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大收效的時候。古人謂一言可以終身奉行，真有此理。」

第七章 爲學與做事的精神

學問與事功，本不容易兼而有之，曾氏值大亂之時，半世生活在槍聲劍影之中，而他的學問事功，雙方都能有很大的成績，不能不令人敬佩他那爲學與做事的精神。

這副精神，說起也很簡單：就是誠拙兩個字。誠就是有真心實意的做事精神，拙就是

有硬幹的精神這兩個字是自命聰明之士所不肯爲的；但是他卻事事誠拙，處處誠拙，我們試拿他所做的事，各舉數例，即可證明他的誠拙態度了。當他初辦團練的時候，大家叫他「曾剃頭」，他卻毫不顧惜的向前去幹。後來守祁門時，懸劍帳前曰：『去此一步無死所。』由保定去辦天津教案之前，把自己後事都辦得妥妥貼貼，預備事若不成，便以身殉。這些事都決不是自命聰明之士做得到的。他是要以誠拙精神，挽救天下姦偽變詐的惡習，所以誠拙二字，簡直是他的一種主義，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他說：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偽相容，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事避害，曾不肯捐絲毫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見所著湘鄉昭忠祠記

因此他做事是誠拙的態度，爲學是誠拙的態度，他整個的立身爲人，都可以誠拙二字概括之，所以誠拙的態度，要算他爲學做事精神的總綱。茲再分而述之：

一 爲學的精神

曾氏的才質，不能算是頂高；然而他的學問所以能到深造有得的境地，就完全靠的他那副爲學的精神——困勉，專一，調和。

他時時感覺自己是魯鈍，是拘拙，所以他遇事做腳踏實地的工夫，對學問則做困勉工夫。所謂困勉，是因爲從前孔子把人類才質分爲三等，頭等是天生的聖人，叫做「生而知之者」；次等是教育成功的，叫做「學而知之者」；再次等是苦學成功的，叫做「困而知之者」。凡生而知之的人，做起事來，是自然而然的做得很好學而知之的人，做起事來，便要經過相當思慮，見到確是有人羣的才去做。困而知之的人，因爲才質不如人，所以做起事來，定要經過勉強的工夫，才能成功。孔子又說，這三等入雖然才質各有高下；但是只要努力，最後的成功，還是一樣的。曾氏自認是第三等的資質，所以他時時刻刻要做困知勉行的工夫。換句話說，他學問的成就，是完全由苦學得來的。誠然，做學問這件事，是不容絲毫取巧，才有點取巧，便是空虛不着實，這學問便靠不住；故無論才質高下，做學問

最好是用笨的工夫，工夫用的愈笨，則得的學問愈着實。現在青年做學問，專欲取巧討便宜，而不知一種學術，要想有若干成就，都必經過相當的困苦艱難，與相當的勉強工夫，才能談到有所心得。他嘗引董生之言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他又說：『余觀自古聖賢豪傑，多由強作而臻絕詣。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中庸曰：「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論人者，恆曰某也向之所爲不如是，今強作如是，是不可信，阻自新之途，而長偷惰之風，莫大乎此。』這是在理論上認爲無論是做學問、幹功名，或者是做聖賢豪傑，都須經過勉強工夫，才能成功。再看他自己做學問的實際情形，幾乎無一處不是孜孜矻矻，由困苦中得來。他始初在京城國史館做協修官時，曾自訂課程十二條，凡讀書爲人之道，盡在其中。後來雖軍事吃緊之時，然而他的日常功課，不曾稍懈，他的軍政大事，又不假手他人，而每日猶看讀寫作不輟，就知他無時不在困勉之中了。

其次便是專一的精神。專一就是對一種功課，專心致志去求精。他嘗謂『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這就是說天地

間學問甚多，與其貪多而無所得，倒不如專求一門，還可以得用。他說：

『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

他所謂專的意義有兩種：一是專藝，二是專心。專藝就是專求一種學問，在他那時，是或專一經，或專一史，或專攻其他任何一書。他自己讀書，是一書不完，不換他書；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他定要把一書研究得精通爛熟，甚至終身以此一書為研究中心；此之謂專藝。專藝之外，更要專心。專心就是拿全副精神專注在一種書上，就是俗語所謂一心無二用。他說：『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為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無別書也。』這幾句話說明專心的意義，是再透澈沒有了。現在學校之中，要求專藝，自然是不可能，而事實上曾氏亦決不是叫人專藝便不多看書；他屢屢教人要多看書，謂不多看書則太陋。不過他是不要人泛濫無邊的亂翻亂看，無系統，無中心目標；意謂這樣看，不過是求個外表，求人知我廣博之名而已，終不會有精蘊的心得，終其身亦難有專長。如能每看一書，皆以全副精神貫注到底，日積月累，守之終

身，則既精且博，可以受用無窮了。

再次便是調和的精神。所謂調和與精神，亦可以說他是折衷的精神，亦可以說是兼取衆長的精神。前人爲學，往往標榜門戶，攻擊異己，他是最不主張的。他覺得學問本是天下公物，不應該有主觀成見參雜其間。他覺得各家學問都必有其長處，若能去短取長，則不但無門戶相標的必要，並且有兼取衆長的好處。這種精神，在清朝學者中，最爲難得。自命是漢學家，便攻擊宋學家；自命是程朱派，便攻擊陸王派。古文家亦有所謂桐城派、陽湖派之別。他是宋學有根基，漢學亦有相當的研究。在宋學之中，他是以程朱爲體，而以陸王爲用；他覺得學問專主一家，是把自己看小了。他不但對當時學者，是用的這個調和的態度，他對諸子百家，也要做這一爐共治的工夫。他嘗說：『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虛靜，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又說：『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僞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凡此都見得他爲學的調和折衷的態度。這種兼取衆長，一爐共治的精神，要算他爲學的最大目標，也算是最大成功。

一 做事的精神

曾氏生平的最大成就，自然要推他的事業。他事業之所以成功，則不得不歸功他那種做事的精神。那種做事精神，在他的行事上，在他的作品中，隨處可以見到，現在把他歸納起來，可分爲三項：一是確定規模；二是腳踏實地，不尚浮華；三是寬大與精細。茲依次述之：

他凡辦一事，都是先確定一個規模，正如現在各機關裏面的規程和細則。凡辦事的方針，和應取的態度，都具在這個規模之中。有了這個規模，就算有了辦事的綱領；不但可以督勵他人使努力前進，並且可以督勵自己，使勿鬆懈。當他初辦團練的時候，立定宗旨，不要油頭滑面，有市井衙門氣的人員，專取忠誠有肝膽者爲長官，而以年少樸實有農民氣者爲士卒；自己則以不怕死不愛錢一語爲圭臬，這便是他初出山時候的規模。犯了他這個規模，他便不客氣的向前硬幹，無論怎樣誹謗他也是毫不顧忌。因爲規模既爲一切行事的總方向，假如可以任意的破壞，或可以任意的放鬆，這規模便立不穩，一切事亦無

從下手了。所以他把辦事的規模，看的很重。嘗謂『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即人之所以爲聖人，亦係先立規模，後求精熟。』又曰：『我輩辦事，成效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立者。』所謂我有可以自立者，就是自己的規模實在是大公無私，可以爲人共亮。我們看他生平的事，時候至一身一家，大至軍事政事，均先立定一個規模，始終守之，雖經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最後的勝利，總是屬他，這是他確定規模的效驗。

立定規模之後，還要看是否真能切實做事，才能確定其成績。常見規章立得異常嚴密，而做起事來，則又鬆懈不踏實，這就是因爲做事的人，不重在實際，只重在虛文，把外表做得極好看，話說得極好聽，這件事情就算辦過了。曾氏是樸實諳練，洗淨浮華，重實效而不尚虛文。當他初練鄉勇的時候，經費十分困難，士卒的衣裝，都無從辦起。他心裏想：練鄉勇，是要殲除土匪，保衛地方的，只要他們知道愛鄉里，愛百姓，勇敢善戰，便是有其實際了；至於衣服軍容，自然在有錢時期，也不少可，然究竟是浮華的虛文，無關於戰鬪的能力，與戰鬪時的勇怯。後來湘勇奉命出境剿敵，身上衣服，皆破爛不堪，形同乞丐；一般養尊處優

吃糧不打仗的官兵，一見這些乞丐也來打仗，莫不掩口而笑。但是到了打仗的時候，到個驃悍善戰，奮勇爭先。這是曾氏不尚浮華的一個實例。

這一個實例，可以代表他樸質的精神。在他那種人才經濟俱感困窮的時候，這種精神，真是救時的良劑。他時時要希望轉移士氣，就是要希望轉成這種樸質之氣。

在他做事精神之中，尤占重要性的，要算他那寬大與精密的氣象。原來寬大與精密，本是一體兩面，必須合而爲一，才沒有流弊。不然的話，度量是寬大了，而臨事不精密，其流弊則至於鬆懈；若處處表現着精密的樣子，而沒有寬大的器量，其流弊則至於繁瑣而不能容物。他能參合並用，故能一無流弊，而收得人之效。

一面看去，曾氏做事實在是很苛刻；但須認清一個界限，就是他的苛刻，全是對事，不是對人。對事是苛刻，對人是寬大。並且所謂對事，也不僅是對他人之事，凡他自待，無一處不是十分嚴厲，對屬員則又提攜培植，無所不用其極，縱遇他人掣肘，他惟責備自己，而不怨恨他人，這是他的寬大。

所謂精細，就是他辦事方法的精密。他說：

『治事之法，以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爲主。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查鄉里；治軍則親巡營壘，親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先要擘得開，後要括得攏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認真看公牘是也。手到者，於人之長短，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是也。口到者，於使人之事，警衆之辭，既有公文，又不憚再三苦口丁寧是也。』

這是他做事的一套法寶，對己對人，都是一樣。自今日言之，就是他做事精神，完全是合乎科學方法。在他所謂五到之中，別的且不去說，所謂「心到」就是說凡辦一事，起初不妨分析得很細，愈是頭緒紛繁的事，愈是要分析得精細清楚；但是各項頭緒的最後結果，還要殊途同歸，不相衝突。不然，便是繁瑣不得大體，事體愈辦愈糟了。他所謂先要擘得開，後要括得攏，便是先分析，而後綜合，正是科學方法的重要條件。其他所謂身到，眼到，手到，口到，都見得他凡事考核精密，一絲不肯放鬆，有如此精細的精神，又有如彼寬大的器量，此各項人才，所以樂爲之用也。

以上所述爲學與做事，在他活動的本身上，原是分不開的。且如他說：

『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書中之義，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乎？』

這是見得他爲學的時候，都一一體貼到身上去。他的意思，爲學不能有用，只能算是識字的牧豬奴，而當他做事的時候，則又時時思念到書中的意義，在他日記中，曾說到『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爲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其拂逆，以磨礪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這是見得他借做事以磨練自己的學問。

原來學問一個名詞，有動與靜的兩面：靜的方面，就是常人所認爲的讀書爲學；動的方面，就是要在自己所做的事上磨練自己的經驗才能，其結果便是學問——活的學問。做官就在官上求學問，做農就在農事上求學問，一切的事，都有其所以然的道理；這種道理，書本上是不一定可以供給我們的，必待自己親身到事上去磨練，才能得到這種活的學問。等到這種活的學問得到了之後，則又處處與書中之義相合，僅求靜的學問，而不在

事上磨練，以求其經驗才能，其結果乃變成書獃子。只知做事而不留心於學習，其結果或者會變成老奸巨猾不學無術。二者闕一，都不配稱爲學問。曾氏生平，是處處拿靜的涵養去培植動的事業；同時又處處拿動的事業去磨練他的德性。質而言之，在他活動中，本不能分出何時何處是爲學，何時何處是做事。本章所述，一方是爲敘述的便利，一方也不免有割裂之痕，讀者心知其義可也。

第八章 結論

曾氏的事業學術，既敘述於以上各章，茲更取其行誼，尤足爲吾人效法者，摘取四端，作爲本書結論。

第一就是「誠」字。在上面曾經提過，曾氏生平最服膺的就是一個誠字。他自己立身爲人的根基在此，進退人才的標準也在此。誠字淺言之，就是老老實實的，不欺人，亦不自欺；但是做到極境，就是聖人，也不能出其範圍。這個字的涵義，不僅是把自己做到不欺的地位，就算完了，還要把天下之人，都化導到誠的地位，才算是成功。所以誠字的範圍極

大而做起來則須從不欺下手。不欺有兩方面：一是不欺人，二是不自欺。不欺人很難，而不自欺尤難。曾氏生平無一欺飾語，待人接物，皆一本至誠，而尤能不自欺。譬如他自知魯拙，於是就孜孜矻矻，做困勉的工夫與踏實的工夫；有此一念，不敢自欺，後來學術事業的成就，遂皆得力於此。假如已經是魯拙了，還要自以爲是聰明，凡事想取巧討便宜，這便是自欺，並且是一事無成。他能自知魯拙，而隨時隨地做魯拙工夫，這便是勝過常人的地方。常人總是自居聰明，而羞爲魯拙，明明是魯鈍了，還要自命是聰明。其實曾國藩亦何嘗比我們還魯鈍些？他也不過是安於魯鈍之名，以行其困勉之實罷了。他生平行事，自聰明人看起來，幾乎無一處不是魯拙，即看他的行事成績，或者也要以爲平淡無奇吧。然而我以爲他最大的成功，最足以爲吾人效法者，便在這魯拙與平淡無奇。這魯拙與平淡的態度，就是誠字的表現。

其次便是「勤」字。上面所說的誠字，是他一切行事的總綱；此處所說的勤字，和下面還要說的恆字與耐字，都是達到誠字的方法。假如僅僅立一個誠字做目標，而不能日日用力向此目標做去，這不但是空言無補，並且自欺欺人，根本就不能叫做誠。他立了這

種種方法，無非要求達到成己成人——誠的地步。他認定做學問最重要的便是要自強不息；不能自強不息，便要苟且偷安，日趨於懶惰。他說：『百種弊病，都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懈，則百處懈矣。』又說：『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他認定這個目標，所以他是無一事不勤，無一時不勤，他幾乎認爲勤字是成人的一個祕訣，所以說：『家勤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永不貧賤。』他自己是終日不敢有一息偷安，治家教子，也是處處以勤字爲訓，對將士則曰：『治軍之道，以勤爲先，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勸誠州縣官委員的，亦時時以習勞動儉爲主，卽批答各處稟牘，亦以勤字爲中心。他說：『勤就可以生明。』這真是他深於體會，才有這個認識。大概天下一切罪惡，都由閒暇時間造成的；閒暇時期多了，就會想法子去做那些無聊的事；日久不但自己習慣弄壞了，聰明智慧汨沒了，一切壞事都會由此而生。假如終日勤勞不息，原來不會做的事，都漸漸的會了，日久不但事體是精熟了，並且智慧也好像聰明了許多；所以無論何人，所做何事，只要能終日勤勤懇懇的埋頭去幹，其成績必甚可觀。掉轉過來，這一個人總是時時閒暇着，就可決定這個人的前途，是沒有多大希望的。曾氏在公務之

餘，還要每日讀書、習字、做詩文、下棋，我們可想見他勤的程度了。

再其次便是「恆」字。恆是輔助勤字使不間斷的一種力量；因為勤固然很要緊，假如沒有一個恆字，則勤的效力，或者也甚微細。一時興奮起來了，甚至廢寢忘餐，勤勞過度；這個興頭過去了，則又鬆懈如故，那就合上孟子說的「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了。所以有恆二字，實爲學者萬不可少。道光二十四年，他與諸弟的信中有一段說：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爲主，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日起，至今則一無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按此信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寫的已看過王荊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

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間斷看書之課，又勿以考試將近，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書，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書也。」

此一段看到他守恆的精神與事實，爲的是要使他諸弟明瞭恆字的重要。蓋恆的價值，不因事體大小而分高低，有時愈是小事，愈能顯其價值的高貴。譬如起早，並不能算是

難事，也不能算是大事；但是終身行之而不間斷，這守恆的毅力便很可觀了。曾氏日常生活之中，最可表現有恆的精神。譬如早起、日記、每日讀書、習字、下棋、飯後千步、臨睡洗足，都是守之終身，未嘗稍變。此等處都是平常人認爲小節；正惟其小節，越是不可輕忽。把這種習慣養成了之後，則小節尙不輕忽，大事自然格外謹慎；並且這種習慣養成了之後，生活才能紀律化。青年往往習於自由生活，浪漫生活，於是生活無紀律，行動無紀律，實在是不好的習慣，這種習慣根本不適於現代，吾人不可不多多注意。

最後要說的是一個「耐」字。耐如忍耐、耐勞、耐苦之耐，有堅忍不移之意。這個字是他教人守恆的一個方法。大概在日常生活中，守恆固難，而遇到困難的阻撓，則守恆尤爲不易。常人總是一遇困難事體，便中止了，他教人一個耐字訣，就可以免了這種現象。他說：『讀書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這是他對耐字的解說，在他家訓中有一段是給紀鴻的信，教他習字的方法，亦正是發明耐字的意義：

『以後每日習柳字百個，……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

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難之時，打得通時，便是好漢。』

這一段中所說的熬字，我以為就是耐字的作用。能多耐過幾次難關，學問便有幾次的進步。在這種極困難的時候，還要能持之以恆，不改常度，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所以他把耐字，改成熬字，還要加上奮的力量，就可知道這個關頭確不容易過去。若沒有堅忍的耐心，恐怕就要被困難阻撓住了。而且這個困難，還不止一次，雖然熬過一次，便有少許進步；但是方見進步，卻又有第二次的困難。定要經過若干次的熬，若干次的奮，然後才達亨通精進的境界。這若干次的困進，就不是一般浮躁人所能打得過了，所以他說，『打得通時，便是好漢。』

以上所舉這四個抽象的字，自然是近於老生常談；但曾氏畢生精力卻大部分貫注在這四個字上；欲學曾氏，則先從此四字着手，至少是與青年身心有很大的裨益。

本文庫中外名人傳記書目

中華書局編印

希	甘	華	拿	曾	戚	岳	諸	明	唐	漢	秦	孫	孔
特		盛	破	國	繼		葛	太	太	武	始	中	
勒	地	頓	崙	藩	光	飛	亮	祖	宗	帝	皇	山	子
施友忠	陳碧雲	盧文迪	錢子衿	胡哲敷	程寬正	范作乘	韓 棐	陳醉雲	劉逸青	張仲寶	胡哲敷	陳醉雲	黃造雄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一角四分	一角四分	一角五分	一角四分	一角四分	一角	一角六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五分
中國女名人列傳	世界女名人列傳	世界發明家列傳	世界藝術家列傳	世界科學家列傳	世界探險家列傳	世界思想家列傳	世界文學家列傳	世界實業家列傳	世界政治家列傳	中國民族英雄列傳	莫 索 里 尼	福 澤 諭 吉	基 瑪 爾
黃九如	沈茲九	錢亦石	王 隱	皮仲和	朱基俊	黃海鶴	錢亦石	朱基俊	秦仲寶	范作乘	康同行	鮑維湘	鮑維湘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第一册	各一	各一	第一册	各一	各一	各一	各一	各一	各一	第一册	第一册	第一册	第一册
第二册	各一	各一	第二册	各一	各一	各一	各一	各一	各一	第二册	第二册	第二册	第二册
一角四分	角	一角四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一角四分	一角四分	一角四分	一角四分	一角二分	一角六分	一角八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致青年書

本書是著者於民國十五年至最近寫給青年的六封公開信，以最誠懇的態度，討論關於青年各方面的問題，約分求學、治事、戀愛三大類。著者流麗雋逸的文章，是大家所共見的，此集更以文學的方式，敘述人生的問題，我們讀了，不僅可以尚友著者而知道他的思想，且可由此悟到深入淺出的作文要訣。

舒新城著 一冊 三角半

青年叢書之一

中華書局出版